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前言	vii
<hr/>	
第一章 绪论	1
<hr/>	
第二章 《沧浪诗话》英语翻译的百年图景	7
<hr/>	
2.1 西方文学史对于《沧浪诗话》的书写历程	7
2.2 西方文学理论界对于《沧浪诗话》的关注	17
2.3 西方对《沧浪诗话》作者诗歌作品的译介	22
<hr/>	
第三章 《沧浪诗话》的首个英语全译本研究	36
<hr/>	
3.1 译者能动与读者定位的双向循环	37
3.2 文化缺省与反常忠实的补偿策略	44
3.3 首个英语全译本的汉语底本考略	53
3.3.1 德译本的文化规范导向	54
3.3.2 译者显身与从众效应的突破	61
3.3.3 话语共同体与译者注释体例的内在需求	64

第四章 德国诗人对《沧浪诗话》的英语翻译

69

4.1 场域生成：母语原则的失效与翻译二元方向性的突破 ······	70
4.1.1 文化联动：德译对英译的影响焦虑与英译对 德译的底本超越 ······	70
4.1.2 译者显身：诗人译诗论的意义澄清与译者的 “恋古情节” ······	74
4.1.3 赞助导向：刊物主编的文学坚守与 <i>Coyote's Journal</i> 的“心仪东方” ······	75
4.2 主体彰显：语境的动态调适与文化负载词的转换策略 ······	75
4.2.1 读者预设：副文本的呈现与日语文献的迁移 ······	76
4.2.2 存异谋和：忠实原则的突破与“他者”伦理 的开启 ······	77
4.2.3 文化误读：异质化与同质化的二元平衡与 风险呈现 ······	78
4.3 结构牢笼：场域的资本运行与经典化重塑的传播困局 ······	79
4.3.1 功能定位：刊物边缘化角色与意识形态对抗 ······	79
4.3.2 译传限度：译文流通的时间波动与空间游离 ······	80
4.3.3 译者突围：归化策略与异化诉求的对立与 对接 ······	81

第五章 西方学术界对《沧浪诗话》的阐释

84

5.1 华裔学者对《沧浪诗话》的开创性研究 ······	84
5.2 《沧浪诗话》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对比阐发 ······	116
5.3 西方对《沧浪诗话》概念的创造性解读 ······	146

第六章 《沧浪诗话》在西方传播的现代启示 160

-
- 6.1 后理论时代与中国古代诗话著述的价值重估 161
 - 6.2 跨文化时代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返本开新 166
 - 6.3 全球化时代与文学理论的古今中外四方对话 173

第七章 结语 184

-
- 参考文献 187

绪论

《沧浪诗话》是南宋诗论家严羽¹创作的诗歌理论著作，大约在绍定（1228—1233）前、至迟在淳祐（1241—1252）前成书，具体的成书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仍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沧浪诗话》全书共一卷，分为《诗辩》（亦作《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末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严羽以禅喻诗，提倡妙悟，论诗推崇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反对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倾向，提出“别材”“别趣”，将“兴趣”视为诗歌的特质。

《诗辩》为全书中心，主要阐述古今诗歌创作理论问题，论述学诗的门径、方法，展现作者有关学诗、评诗的理论见解。《诗体》专讲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作家的风格和流派，罗列由先秦至宋代以时间、人物或不同内容、句式等形成的诗歌体裁，且用小注简略说明各体之名的含义，由此探讨诗歌风格体制和流派演进变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诗法》讲诗歌作法和艺术特征，指示初学者作诗的基本技巧与方法，提出学诗要先除五俗，包括俗体、俗意、俗句、俗字和俗韵。《诗评》是从时代风气和个人风格方面对古今诗歌和诗人进行评论，

¹ 具体生卒年不详，大约在1192—1197年间出生，1241—1245年间去世。

品评《楚辞》以来各家诗作的优劣等次，进一步阐明汉魏盛唐诗为“第一义”的理由。《考证》是关于诗歌创作者和具体出处的辨析和考证，主要是用鉴赏的手段考辨某些诗篇的作者、分段、异文、写作年代等，时而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

《沧浪诗话》对古代诗歌的流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和诗歌创作的特殊性，强调了诗歌创作注重形象思维、富于情感等特点，其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格调派”“性灵派”“神韵派”等诗派。

此外，《沧浪诗话》包含许多精辟的诗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形容事物隐晦难寻，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又如“言有尽而意无穷”，指诗歌言语精炼而意味无穷，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命题；再如“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强调语言以干净利落为贵，不宜拖沓冗长。

从后世影响来看，《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类著作。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古典诗歌理论的贡献。《沧浪诗话》主张以禅喻诗，强调“妙悟”，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和创作的特殊性，如“别材”“别趣”等。严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本质、创作方法、鉴赏技巧等，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和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二，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沧浪诗话》推崇盛唐诗歌，反对宋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倾向，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格调派”“性灵派”“神韵派”等诗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严羽强调诗歌应当表达诗人真实的情感，追求自然、真实、生动的艺术效果，这一理念在后世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广泛体现。

第三，对文学理论家的启发。后世的一些文学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都在《沧浪诗话》的理论思维基础上推陈出

新，为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智慧。

第四，对古典诗歌研究的推动。《沧浪诗话》为古典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诗歌的情感表达和意境创造。

综上所述，《沧浪诗话》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还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文学理论及古典诗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事实上，《沧浪诗话》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回响。1986年王丽娜在《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一文中，不无忧心地指出：

国外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翻译、研究与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相比，是极为薄弱的，因为国外学者一致认为翻译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十分困难，除《文心雕龙》、《原诗》等少数著作的内容达到条分缕析、结构严谨而外，大多数的批评论著是以零散形式写出，不易把握其理论系统。而且，在中国古典的批评著作中，同样的术语，即使在同一论者笔下，也常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术语，事实上又往往表示同一概念。另外，某些批评家还常常用高度诗化的语言来表达直觉感受而非理性观念，直觉感受就本质而言是难以明晰界定的。故此，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译著比起有关翻译、研究中国小说、戏曲、诗歌的译著来，也就少得多了。（王丽娜 1986：73）

对于《沧浪诗话》，也同样如此。但时隔40多年之后，海外关于《沧浪诗话》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本书以《沧浪诗话》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探

讨其中涉及的翻译主体、阐释空间、价值定位等问题。与此同时，本书还探讨了海外《沧浪诗话》研究与中国传统诗学形成的对照关系，进而揭示海外世界从其具体文化语境出发对中国诗学观念重构的启示性意义。

在此需要特别点出的是，目前学界的《沧浪诗话》海外传播研究已取得多项成果，但仍然存在较大拓展空间：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对《沧浪诗话》海外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分期、路径动因等关注较少，所以本书尝试进行过程性建构，补充和完善缺失的关键环节，描绘出《沧浪诗话》在海外不断延展的历史图景和持续生成的生命活力。在研究视角上，既往研究多对《沧浪诗话》在海外的翻译进行线性描述，本书则尝试突破立场限制，秉持理论关怀，在立足关系本位基础上，全方位考察《沧浪诗话》在海外经历的“融汇古今、联通中外”的互动历程。在研究对象上，本书尝试将《沧浪诗话》视为“历史流传物”，研究其在海外的文化重构过程中，是如何与所在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关联、对话，甚至是走向杂糅的，以及海外学者是如何对《沧浪诗话》进行译介书写、意义阐释和价值重构的。

本书力求对《沧浪诗话》的海外传播影响进行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研究，多维度解析其空间的差异性、时间的断裂性、视角的错位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其意义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化和拓展《沧浪诗话》的意义阐释空间。海外学者与中国本土学者存在着迥然有异的理论旨趣、学术背景及关注视角，若能系统梳理其研究成果，可以为本土《沧浪诗话》的返本开新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体系，有助于将《沧浪诗话》的意涵解读由单声部的汉语文化语境走向多声部的国际语境。本书以海外《沧浪诗话》研究与本土研究为参照，使双方互为镜像，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实

现从旧有学术范式向新型研究范式的转换，为开掘《沧浪诗话》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

第二，展现“诗话”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参照价值。西方理论在为人们解读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重要启迪的同时，也会部分遮蔽读者对于文学内在审美感受力的体悟。为开拓理论视野，本书尝试在充分借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突破理性认知崇拜，重点关注中国诗话及其代表性著作《沧浪诗话》能否实现由“历史走出去”（如传统上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诗学影响）到“当代走出去”，在整个国际文学理论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第三，完善学术史，更加全面地描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图景。《沧浪诗话》不完全是静态的语言文本，而是动态的意义生成。本书尝试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梳理其海外传播影响及生成模式。在学界广泛关注西方文学理论怎样“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本书逆向反观，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最能代表诗话类著作特色的《沧浪诗话》是怎样“东学西渐”，在异域传播接受的。此种研究，可以为学界更为全面地厘清 20 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理论的互动关联提供生动的案例说明。

本书秉持守正创新和现实关怀的原则，通过梳理学术史，探讨《沧浪诗话》等传统文论话语在翻译中的阐释范式转换问题。这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诗学传统、审美规范、意识形态等因素。本书最后一章回顾和反思了《沧浪诗话》百年译介历程，试图以学术理论研究提升顶层设计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在分析《沧浪诗话》以“介”“译”“释”“研”“构”五部曲为特征的海外传播路径和影响效应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走出去”展开深入思考，并提出回归文本诗学、调适翻译策略、契合目标语文化语境等对策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采用谱系学描述，首先绘制空间序列和时间链条，动态描述《沧浪诗话》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图景，进而勾勒出《沧浪诗话》产生海外影响的演变轨迹和历史，并深入分析其中的变量、关键制约因素。其次，本书采用对比均衡视角，以刘勰《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作为参照体系，通过对比《沧浪诗话》与《文心雕龙》海外传播与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揭示《沧浪诗话》的影响路径和效应。最后，本书尝试借鉴系统论、阐释学、翻译诗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理论旅行、译者行为批评等研究方法，立体建构《沧浪诗话》海外传播影响与视域融合的基本模型，并对其中的关键机制进行深度剖析。

《沧浪诗话》英语翻译的百年图景

回顾历史，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曲等的研究，英语世界对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关注是少之又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维廉(Craig Fisk)才在“中国文学批评”(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这一词条当中作出这样的评述，“在所有中国文学的主要文类中，文学批评显然是最不为世人所知的”(Fisk 1986: 49)。这一点，从《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形也可以看出一二。

2.1 西方文学史对于《沧浪诗话》的书写历程

依据历时的发展脉络来看，在早期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选集和相关学术专著中，《沧浪诗话》是很少被提及的。下文略举几部著作作简要说明。西方学界关于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想法由来已久，甚至可以往前推到 17 世纪。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当时任职于耶鲁大学)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General Principles for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的几个原理》)，早在 1697 年 12 月，“德国哲学家哥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就提出

要撰写一部全面的、详细的‘中国历史著作’”(Knechtges & Owen 1979: 49)。¹这里莱布尼茨提出要撰写一部“中国历史著作”，但既然要追求全面和详细，自然也就会涉及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因而我们可以说，17世纪末期西方学界就已经产生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想法。不过此时这还只是一种愿望，并没有落实。

真正将这一想法落实时，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初。1901年，英国剑桥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翟理思(Herbert A. Giles)出版了*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自称“这是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使中国人也没有用中文写过”(Giles 1933: v)。称其为“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未免有些夸大，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但在英语世界这的确应该是第一部。陈受颐(Ch'en Shou-Yi)在*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中国文学史略》)的前言中就提出：翟理思的这部著作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Ch'en 1961: vii)。

不仅如此，翟理思的这部著作还是20世纪上半叶对欧美学界产生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此书于1923年、1933年在美国再版过两次，后来柳无忌(Liu Wu-chi)在此基础上增补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部分，于1967年在美国再次出版。翟理思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翻译了大量诗歌、古文，但作者自己的论述较少。林语堂在为陈受颐的*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所作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翟理思的这部文学史，“翟理思大约半个世纪前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名不符实。它只是一系列关于中国作品的论文，缺乏一

1 根据康达维和宇文所安的介绍，莱布尼茨的这一观点是在他写给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这封书信写于1697年12月2日，现收藏于华盛顿大学。

个连续性的大纲。虽然书中翻译了很多诗人的作品，研究了许多作品有趣的方面，收集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但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却并不清晰”(Lin 1961: v)。由于翟理思并未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而且翻译内容过多，他没有论述很多作品和现象，其中包括严羽的《沧浪诗话》。也就是说，在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沧浪诗话》尚未占据一席之地。

1948年法国学者奥迪勒·卡尔滕马克(Odile Kaltenmark)出版了*La Littérature Chinoise*(《中国文学》)¹一书(Kaltenmark 1948)。此书由安妮-玛丽·盖根(Anne-Marie Geoghegan)翻译成为英语，在美国出版(Kaltenmark 1964)。全书共九章，从先秦的周朝一直描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章节安排来看，此书应该是一部比较标准的“中国文学史”。不过仔细阅读此书，就会发现作者也没有提及严羽的《沧浪诗话》。

1964年美国华裔学者赖明(Lai Ming)出版了一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同样也没有提到《沧浪诗话》。时隔两年之后，也即1966年，柳无忌出版了*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概论》)。在导言中，柳无忌称“此书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特别强调重要的作家作品，对此我在有限的篇幅中给予了尽可能多的讨论”(Liu 1966: vii)。柳无忌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作家作品，他不会给予太多的讨论。有意思的是，柳无忌在此书中对严羽的《沧浪诗话》只字未提，这说明在他看来《沧浪诗话》并非特别重要的作品。这一点从他所列的“延伸阅读书目”中也可以看出：在“文学批评”下，他列出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陆机的《文赋》，还评价这两本书是“中国

1 此书也是法国非常有名的“Que sais-je”(我何知)系列中的一部。

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同上：296）。柳无忌并未列举严羽的《沧浪诗话》，说明他认为《沧浪诗话》的重要性比不上《文心雕龙》和《文赋》。

由此可以看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中几乎未曾提及过《沧浪诗话》，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典文论翻译难度极大，而《沧浪诗话》存在术语概念模糊、理论系统分散、诗化语言难以界定等特点，自然更难翻译。当然这些著作中有一部例外。那就是1961年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出版的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一书。在这部著作的“宋代文学：传统诗歌”一节中，陈受颐这样评介《沧浪诗话》：

宋代晚期，诗歌评论随之兴起，最著名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抨击宋诗而偏爱汉魏古诗，他鼓吹拥护三世纪至八世纪以来的主要著名诗人，同时正确论述了宋诗最大的弱点，即把写诗与语言学、学识和议论等同起来，导致诗歌缺乏情感深度和强度。但严羽所提的关于如何写好诗的建议却是有缺陷的，他不提在诗歌中如何表现诗人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只强调回到唐代和前唐的模式，并以此作为最好的完美的标准，完全抹杀了宋代诗歌的创造性。（Ch'êñ 1961: 390）

林语堂在为陈受颐这部著作所作的序言中曾称，“毫无疑问，撰写文学史著作是非常艰难的一项工作，里面的每一步都会涉及评价和个人判断”（Lin 1961: v）。的确，文学史并不只是平铺直叙地罗列一些事实，它必然会融入一些撰写者对于这些事实的看法和评价。我们从陈受颐的这部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严羽的评价：他既看

到了严羽对于宋诗批评的价值，又看到了严羽所提方法的问题。简而言之，在陈受颐的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一书中，作者专设一个段落来说明《沧浪诗话》，可以看出严羽受到了重视，但其定位并不算高。

统观 20 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对于《沧浪诗话》的了解很少，即使像陈受颐有所提及，也并无甚高的评价。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一些辞典中也有所体现。英语辞典中是否收录严羽或者《沧浪诗话》，与教科书和著作的意义相似。如果有辞典将之收录，对于严羽或《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中的接受无疑可以起到极大的扩散作用。所以我们在考察教科书对于《沧浪诗话》的书写时，同样也有必要观察一下英语辞典是怎样介绍《沧浪诗话》的。

1867 年英国学者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编纂了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中国文献说明》)¹ 一书，此书后来于 1902 年和 1922 年在美国再版过两次。在该书第四章“集”的部分，伟烈亚力专门列出“诗文评”一节。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简要介绍了刘勰的《文心雕龙》、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王正德的《余师录》、李东阳的《麓堂诗话》、王士禛的《渔洋诗话》等多部中国诗文评类的著作 (Wylie 1902: 243–249)，唯独

1 该书最初是 1867 年在中国上海出版，后来在美国多次再版，1964 年我国台湾又重新再版过。笔者阅读的是 1902 年和 1922 年美国的再版本和我国台湾的再版本。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三个版本基本相同，文字上没有什么修改，不过装帧和印刷越来越精致。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英文书名中的 Chinese Literature 并不是指“中国文学”，而是指“中国文献”，这从书中四章的内容编排中也可以看出。全书共分为“经” (Classics)、“史” (History)、“子” (Philosophers)、“集” (Belles-lettres) 四个部分，由此可以得知，这四个部分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是指 literature 在英语当中比较早的一个意义——文献。

没有提及严羽的《沧浪诗话》。由此也可以说明，当时《沧浪诗话》尚未进入英语世界学者关注的范围之内。

在 1909 年出版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严”字下并未出现“严羽”(Williams 1909: 915–916)，而“沧”字下尽管出现了“沧浪”，解释却是“现在山东境内或山东附近两条河的名称”(816)，说明此处的“沧浪”并非严羽，更与《沧浪诗话》无关。在英文著作中，最早提到严羽名字的是翟理思编撰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一书。此书 1912 年出版，书中有“沧浪客”一词，即指“沧浪逋客”。而西文中第一篇概述和译介《沧浪诗话》的文章，是张彭春在 1922 年英文版《日晷》(*The Dial*) 73 卷第 2 号上发表的“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严羽的〈沧浪诗话〉》)一文。¹1929 年，张彭春的这一译文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研究所出版社出版(共 10 页)，书前附有斯宾迦所撰序言。这些材料表明，在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接受。关于张彭春的《沧浪诗话》翻译，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如钟厚涛 (2009: 56–67) 在《异域突围与本土反思——试析〈沧浪诗话〉的首次英译及其文化启示意义》一文中指出，“上个世纪 20 年代，《沧浪诗话》之所以能够受到作为‘新批评’派‘巨擘’的 J. E.

1 张彭春 (1892—1957)，字仲述，出生于天津，中国近代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外交家，张伯苓的胞弟。1904 年张彭春入其兄张伯苓建立的天津敬业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学习，1908 年毕业并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10 年去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攻读硕士期间，张彭春翻译了《沧浪诗话》。1916 年回到天津，协助其兄张伯苓主持南开中学并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其间善于创新改进，极大推动中国话剧的发展。1919 年，参与“五四运动”，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 (John Dewey)。1923 年 9 月，任清华教务处长；同年，与文友发起组织“新月社”活动，后移居美国。1957 年 7 月 19 日因心脏病发作在美国逝世。

Spingarn 的青睐，与当时美国文化的内在需求和论争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J. E. Spingarn 对《沧浪诗话》的关注，是在一种‘求用’而非‘求真’的立场上来完成的。这种应用型的关注立场，对于《沧浪诗话》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选择对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任先大（2011：21）也认为，“进行欧美汉学界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的星星之火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点燃的”。

不过整体观察，张彭春的《沧浪诗话》译文在当时的接受范围相当有限。例如，在 1947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中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严”字下并未出现“严羽”这个词条（Mathews 1947：1099），而“沧”字下虽然出现了“沧浪之客”且其解释为“a vagabond”（同上：984），但此处的“沧浪之客”并不确指严羽，它有可能是指《楚辞》中的那个沧浪之客。1966 年出版的《中国古文大辞典（法文注释）》（*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虽然收录了“沧浪”一词（Couvreur 1966：519），但与《沧浪诗话》并没有关系。此书的另外一处虽然将“严”字单列，但并没有出现“严羽”这一词条（同上：156），所以从整体上而言，该辞典没有介绍过严羽或《沧浪诗话》。

从上文对一些重要辞典中收录《沧浪诗话》或严羽的情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并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慢慢地发生转变，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对此，亨利·哈特（Henry H. Hart）在 70 年代初为他自己所编选翻译的一部中国诗歌集所作的序言开篇就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机构中对于中国的研究在迅速地扩张”（Hart 1974：vii）。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产出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向学术界特别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展现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此，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刘若愚（James Jo-Yü Liu）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曾专门撰文呼吁要强化中国文学史的写作：

未来另外一个可能的任务是撰写出一部全面的、详细的、最新的、有批判性的中国文学史……这部中国文学史以一己之力当然难以完成，因而需要多位专家集体合作。这些专家虽然研究的是不同时期或不同文体的中国文学，但他们对于文学历史都有共同的看法。当然，这项工作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历史学家都能编写出《剑桥中国史》的话，我们文学研究的学者难道不能考虑以类似的方式去努力吗？
(Liu 1975b: 30)

刘若愚首先看到了在西方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迫切性，所以康达维和宇文所安才认为刘若愚的这一呼吁是“非常犀利的”(Knechtges & Owen 1979: 49)。另外，刘若愚还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编写方法，即多位专家共同合作，而非某位专家单独完成。后来，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著述基本上都是沿袭刘若愚所倡导的这一方法完成的。

在刘若愚提出这一呼吁的同时，其实已经有学者在实践层面上作出响应。例如，康达维和宇文所安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合作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对此，他们有过这样的回忆，“1974 年春天，耶鲁大学出版社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能否编写出一部像《剑桥英国文学史》那样既权威又详细的中国文学史。事后，我们马上起草大纲，并就此互相交换意见、互相批评”(Knechtges & Owen 1979: 49)。在新诞生的中国文学史中，大部分都对《沧浪诗话》

进行过专门的介绍。相较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之前的情形，这一时期《沧浪诗话》的地位无疑有了较大的提升。整体而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关于《沧浪诗话》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重点多集中于“妙悟说”“别材别趣”等核心理论概念的阐释，但仍属汉学研究的边缘领域。需要指出的是，《沧浪诗话》早期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阐释，多是由华裔学者完成的，背后有多重原因。

从文本翻译的难度来看，《沧浪诗话》是一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禅宗哲学和古典诗歌的理论著作，语言凝练，充满隐喻和文化特异性，内容比较晦涩，翻译成本较高而受众有限，依赖译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背景知识，而华裔学者在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华裔学者通常具备母语或近母语水平的中文能力，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原文的细微含义，如“妙悟”“兴趣”“别材别趣”等抽象概念。这些术语在中文语境中有丰富的哲学和美学内涵，华裔学者因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把握其意蕴，避免翻译中的文化失真。西方本土学者可能因语言和文化隔阂，难以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翻译时不易传达原文的精髓，往往会遭遇“出力不讨好”的困境。即使精通中文，也可能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翻译时需要更多注释或外部资源支持，增加了翻译的复杂性。

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看，在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和诗学的华裔学者在汉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往往在欧美大学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入研究。这种跨文化学术背景使他们成为翻译《沧浪诗话》的理想人选。例如，华裔学者余国藩（Anthony C. Yu）和林顺夫（Shuen-fu Lin）在研究中国诗学时，经常涉及《沧浪诗话》的理论，他们的翻译或摘译常出现在学术论文或专著中。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限于翻译，还包括将严羽的诗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如直觉论或浪

漫主义）进行比较，深化了跨文化对话。

从研究资源的获取来看，华裔学者更容易接触到中文原典、校释本和相关研究资料（如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这些资源为翻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此外，他们可能与中国的学术圈保持联系，能够获取最新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支持翻译工作。西方本土学者虽然也能获取这些资源，但因语言或文化障碍，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完成。

从学术传承角度来看，许多华裔学者在学术生涯中受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前辈（如高友工）的影响，这些前辈的研究往往涉及《沧浪诗话》等诗学经典。华裔学者在继承这一学术传统时，自然倾向于选择以翻译和研究《沧浪诗话》为切入点。此外，华裔学者通常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对《沧浪诗话》这样的经典文本怀有天然的学术兴趣，将翻译和研究《沧浪诗话》视为传承和推广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内在动机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

从学术需求的角度来看，《沧浪诗话》作为一部专业性较强的文学理论著作，受众主要为研究中国文学、诗学或比较文学的学者，而非普通读者。由于其翻译市场较小，商业出版机构对其兴趣有限，翻译工作多由学术界自发完成。华裔学者因其专业背景和文化优势，成为这一小众领域的主力。相比之下，西方本土学者可能更倾向于翻译更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或唐诗），因为这些作品有更大的读者群和出版价值。

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中国典籍外译的普遍困境。要想真正实现“文化转码”，需要译者同时具备诗学修养、哲学训练和双语创造力。未来需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依托多种专业力量，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

2.2 西方文学理论界对于《沧浪诗话》的关注

除了文学史之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语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甚至还专门针对这一领域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相关著述。在这一背景之下，《沧浪诗话》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自然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例如，1970 年冬天，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专门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研讨会。时隔八年，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主编宾夕法尼亚大学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在为该书所作的导言中写道，“本次会议中的论文都没有直接讨论一些主要的批评家，因为这些批评家经过翻译和学者的研究已经被很好地介绍至西方”（Rickett 1978：3）。那么，李又安这里所谓的“已经被很好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批评家又是指谁呢？在下面一句话中，李又安马上就给出了答案，“陆机、刘勰、司空图、韩愈、严羽，等等”（同上：3）。由此可以看出，在李又安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认为严羽及其思想已在西方得到有效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又安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这部论文集中共收录了八篇论文，虽然都不是直接讨论《沧浪诗话》的，但至少有三篇论文直接引用了《沧浪诗话》。这些异域学者能够直接引用严羽的观点，说明他们对于严羽的相关论述已经比较熟悉，由此可以证明李又安的判断。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李又安在“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专业术语》）一文中也探讨了严羽的“羚羊挂角”等概念。余宝琳（Pauline Yu）在“Formal Distinction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中国文学理论的形式区分》）一文中对严羽在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在“前后七子”那里的

回应，曾作过较为清晰的阐述，并且还对比参照了严羽的复古主义模仿论和西方象征派理论的差异 (Yu 1983: 42)。林理彰 (Richard John Lynn) 则在多篇文章中梳理了“前后七子”对严羽的继承，并较为详细地勾勒了明清两代诗人对严羽的反驳和批判 (Lynn 1983: 317–340)。如果说余宝琳和林理彰梳理了严羽对后世的影响，那么林顺夫则关注严羽理论的前身，从诗话文体的成熟和诗话作者的职业化两个角度，将严羽的思想追溯到姜夔的诗学 (Lin 1983: 298)。另外，刘若愚、叶维廉、宇文所安等学者对《沧浪诗话》研究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鉴于笔者在下文中将列专章论述，此处就不予过多展开。

1986 年倪豪士 (William H. Nienhauser) 编选出版了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此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极大。例如，1994 年梅维恒 (Victor H. Mair) 在编选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 时，就在全书前面的“书目说明”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首推《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工具，读者在阅读本选集时如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这部指南。倪豪士所编选的词条都非常简洁、权威，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再简化了。……我在此向这部指南表示由衷的感谢” (Mair 1994: xxxiii)。从梅维恒颇带感情色彩的致谢中，我们不难看出倪豪士的这部指南分量究竟有多重。后来，苏源熙 (Haun Saussy) 也曾专门撰文高度评价这部指南 (Saussy 2000: 168–171)。高质量的学术水准自然为更多的学者认可和接受这部著作提供了保障，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出版社便继续再版了这一著作。该书对《沧浪诗话》给予了高度重视，以数页篇幅专门介绍严羽和《沧浪诗话》。随着这部著作被广泛接受，

其中关于《沧浪诗话》的部分自然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慢慢地为更多人所知，中国文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英语世界学者的兴趣。再加上一些华裔学者的大力推广，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例如，李达三（John Deeney）在介绍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iterary Terminology*（《中国文学术语百科词典》）的编辑情况时曾指出，“中国文学的当代传人似乎对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向域外展示无动于衷。现在这一状况已经有所改变”（Deeney 1995：315）。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直接参与了向英语世界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情形下，编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也就逐渐被提上日程。梅维恒主编的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就这样应运而生。他在前言中开门见山地说道，“由于中国文化逐渐为更多的大众所知……许多人都感觉到需要编写一部内容广泛、具有多维价值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当他们遇到中国文学的文体、文本、作家及思潮运动的相关问题时，都可以通过阅读此书来解决。从一开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就是为不同类型的读者设计的”（Mair 2001：xv）。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两点内容：首先，英语世界已经产生了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这样一种需求，也就是说，英语世界的很多读者渴望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其次，梅维恒在编选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时，预设的读者对象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在他看来，一些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同样可以从这部文学史中收获很多。由于多重读者定位，这部文学史可能具有较大的流通阅读面。这自然也就扩大了入选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的传播范围，使其更易为读者所知晓。

也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1991年雷威安（André Lévy）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著作 *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and Classical*（《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时隔九年，倪豪士将之翻译为英文在美国正式出版。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这部著作虽然可以看作雷威安个人的一部专著，但主要还是以教科书的面目出现的。对此，倪豪士在英译本的译者前言中就交代了法语原著出版时的相关情况：当时作者雷威安想到的读者群体是“本科生和有些（或没有）中国文学知识背景的人”（Lévy 2000: x）。当它被翻译成英语之后，这种教科书色彩则变得更加浓厚。译者倪豪士曾透露说，他于1996年在巴黎一家书店里初次阅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要把这部书的一些章节翻译出来，以供威斯康星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史课程的研究生使用”（同上：i）。这说明译者倪豪士也是把它当作一部教科书来看待的。¹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雷威安对严羽的介绍非常有限。在此，我们不妨将之翻译出来，“生活于12世纪至13世纪转折期的严羽认为，诗歌的重要功能是在语言之外传达超越现实的知识。他从禅宗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他的《沧浪诗话》对其后无数的‘诗话’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Lévy 2000: 57）。考虑到这部著作的篇幅只有168页²，其中对于文学批评的介绍只占第二章的一节（第四节），只有短短两页，而雷威安以近乎一个段落的篇幅来单独介绍严羽，已经可以说明他的看法，即严羽的《沧浪诗话》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1 倪豪士在“译者前言”中还特别交代了这部著作与其他中国文学史类著作的差异：它“以文学文体而非政治背景”作为组织全书结构的参考，这种处理方式让他很感兴趣，因而产生了将之翻译为英语的想法。

2 全书168页，包括近20页的索引，所以正文不足150页。另外根据译者倪豪士的说明，法语原版只有125页。

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再考虑到这短短的两页文学批评中，他只字未提在中国学界广受推崇的《毛诗序》、叶燮的《原诗》等著作，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在雷威安那里，严羽《沧浪诗话》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也可以从雷威安为此书所撰的导言中看出。他指出，“本书的目的只是让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些理解，而不是记住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因而此书不讨论过多的人物，只是介绍说明极少数的文学‘明星’”（同上：3）。雷威安能以接近一个段落的篇幅来专门讨论严羽，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严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明星”，而且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文学“明星”。

整体而言，英语世界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是诗学理论研究。英语世界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诗学时，常将《沧浪诗话》作为重要的理论文本。例如，宇文所安在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国文论读本》）中对《沧浪诗话》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探讨了严羽的“妙悟”“兴趣”等核心概念。

二是对比性研究。一些学者将《沧浪诗话》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例如，将严羽的诗学理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或形式主义理论进行对比，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方法。

三是文学批评史研究。英语世界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常将《沧浪诗话》作为宋代诗学的重要代表进行讨论。例如，余宝琳在其著作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解读》）中探讨了《沧浪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四是翻译与注释。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其翻译的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哥伦比亚中国诗歌选集：从早期到13世纪》) 中，曾翻译并介绍了《沧浪诗话》的部分章节。此外，《沧浪诗话》的英语与德语全译本均已出版。

五是专题性研究。英语世界的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沧浪诗话》中的特定主题和概念。例如，林理彰研究严羽的“以禅喻诗”理论，探讨禅宗思想对其诗学理论的影响。

六是教学与传播。在英语世界的东亚研究或中国文学课程中，《沧浪诗话》常被作为重要的教学材料。主讲教师通过讲解、点评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贡献。

总的来说，英语世界对《沧浪诗话》的研究虽然不如其他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那样广泛，但在诗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等领域，仍然不乏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讨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跨文化学术交流，给中国本土的《沧浪诗话》研究带来了一定启发，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2.3 西方对《沧浪诗话》作者诗歌作品的译介

对于《沧浪诗话》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沧浪诗话》作者严羽的诗作翻译上面。作为南宋末期的一介书生，严羽生前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撰写了一些诗论性文字。在他死后未及百年，他的这些诗歌与诗论就被元人李南叔所收集整理，并以《沧浪严先生吟卷》为书名正式加以刻印出版。需要略加注意的是，这个版本中还尚未出现“沧浪诗话”的字样，而且此时严羽的诗作与诗论是并置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流演，明清时期的文人对于严羽的诗论性文字越来越有兴趣，甚至还将这些文字单独辑录出版，并将其命名为《沧